奥地利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与《聊斋志异》

何 俊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107–115 页

内容提要：作为文言短篇小说集大成者，《聊斋志异》无论是就外文翻译语种还是外文版本数量来说，都可算得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翘楚。奥地利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的《聊斋志异》选译本是早期较有影响的德语译本，选译的十六篇故事部分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译文转译而来，部分是对中国合作者王警涛初译的加工。布伯选取的篇章多半是摄人心扉的人鬼恋故事，除舍弃了原作中的评注以外，较为成功地再现了原文。探究《聊斋志异》中潜藏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尤其是“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理念，正是布伯的翻译动机。这个译本受到多位德语世界文化名人的褒奖，在整个西方都有较大反响，反映了当时短篇小说这一中国文类资源以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对西方世界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聊斋志异》德语译本 马丁·布伯

WATERBASED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短篇小说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水平，已经具备描摹社会现实、彰显人间百态的强大功能。而正是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短篇小说经由多种渠道译介而走出国门，被西方学者冠名为Novella或者Novellette。[1]这一广泛译介自然跟当时西方世界对神秘莫测而闭关保守的华夏文化的浓厚兴趣不无关联，而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同一时期西方短篇小说的发展势头不如中国，对中国短篇故事的翻译可以为西人提供参考和借鉴。[2]作为清代短篇小说集大成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彰显出与明代拟话本小说迥然不同的模式和特色，它将内容上的怪异玄妙、情感上的真挚朴素和语言上的清丽典雅熔于一炉，鞭辟入里地刻画了现实生活，辛辣无情地嘲讽了世间丑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之作。

《聊斋志异》集中折射出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社会百态，而且因为精灵鬼怪的云集而充溢着如梦似幻的浪漫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发祥于德国、继而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成为当时德语文化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翻译最热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之一。最早的《聊斋志异》德译本是李德顺翻译的选译本《中国短篇小说》，[3]但这个译本反响寥寥。影响较大的早期《聊斋志异》德语译本出自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之手，1911年由位于法兰克福的吕腾&洛宁（Rütten & Loening）出版社首次发行，后来由多家德国及瑞士德语区的出版社多次重印。

一、译者为谁

马丁·布伯是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神学家、语言学家和《圣经》德语版译者，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积极参加犹太复国运动，在纳粹上台后更是全身心投

1 周发祥，《中国古典小说西播述略》，《国际汉学》1999年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第331页。
2 同上，第331页。
3 Gast Gustav (Hrsg.), *Chinesische Novellen*, übers. von Li te-schun. Leipzig/Wien: BibliographischesInstitut, 1901.

比较-正文.indd 107 17-12-14 下午4:14

入振兴德国犹太人精神力量的工作，后移居耶路撒冷，其代表作品有《我和你》等。他热爱东方哲学，曾一度关注民族心理研究，在人生的多个阶段都表现出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思想的浓厚兴趣。自1905年起，布伯就是吕腾&洛宁出版社书刊的忠实读者，这时他就接触到大量翻译过来的中国文献。他跟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中国讲师王警涛的相识，可能也促进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此外，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创立者——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也对布伯的中国思想研究起到了催化作用。1924年布伯住在法兰克福附近一座叫黑彭海姆（Heppenheim）的小城，定期去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宗教史课程，虽然他1924至1933年间的授课内容大都是犹太主题，但也囊括了其他主题包括道家思想。[1]布伯还与瑞士著名心理分析大师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一起参加了1928年秋卫礼贤学术讲座的讨论。[2]

准确说来，这部《聊斋志异》的翻译者除了马丁·布伯，还应该加上中国合作者王警涛的名字。布伯在译本的前言里也两次提到王警涛的名字，在开头提及自己接触《聊斋志异》“先是通过阅读译文的方式，后来是经由王警涛先生的友好指点”，[3]在结尾处又写道自己的翻译是“在王先生的帮助下”完成。[4]王警涛，1907年2月至1911年12月在柏林威廉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任中文教师，工作之余将一些中国短篇小说译成德语以赚取外快。经中国文学翻译者施特措达（Walter Strzoda）介绍，王警涛与布伯结识，之后在布伯的委托下将很多文献从中文翻译成德语，再由布伯本人加工润色。[5]王警涛自己也曾著书立说，[6]但他本人的真正兴趣不在学术而在政治领域，其翻译客串只是为了挣取外快，回国后他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

好在布伯的后人那里留存有一些王警涛与布伯的通信手稿，这些信件有一部分刊登在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7]中，藉此我们可以对这两人合作翻译《聊斋志异》的来龙去脉有个大致了解。1909年4月14日王警涛给布伯寄过的一张明信片显示，王给布伯寄过一本翟理斯的书，这本书应该可以确定就是《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王警涛在同年4月22日寄出的明信片中写道，二人商议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翻译合作关系并且平分报酬，因为王认为他的翻译贡献并不比布伯少，但布伯出于各种原因不予接受，故而王不得不把自己的翻译视为对布伯工作的协助。[8]从通信可以看出，王最后跟布伯签署了一个领取稿酬总额250帝国马克的协议，[9]而布伯则独自一人承担16篇翻译小说的文责。颇有意思的是，布伯在翻译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翟理斯的英文译本，但是后来又有人把布伯的德语译本回译成了英语。[10]这本自德文转译成英语的译作不仅囊括了布伯翻译的16篇《聊斋志异》故事，还包括54篇庄子《南华经》短文。不过，后人在英译的过程中就没有再借鉴布伯参照过的英译本，而是从布伯的德语翻译重新转译了一次。由于转译的缘故，译文中的某些地方与原文出入较大。

1 Irene Eber, Martin Buber and Taoism, in *Monumenta Serica*, 42(1994), p. 448.

2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Düsseldorf: Diederichs, 1956, p. 363.

3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928, p. ix.

4 Ibid, p. xv.

5 Irene Eber, Einleitung, in Irene Eber, (Hrsg.), *Martin Buber Werkausgabe 2.3. Schriften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3, p. 20.

6 Wang Ching-tao, *Confucius and New China: Confucius' Idea of the Stat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1; Wang Jing'tao, Die Staatsidee des Konfuzius und ihre Beziehung zur konstitutionellen Verfassung, i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16 (1913), pp. 1-49; 王警涛，《民生主义人口问题》，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

7 Hartmut Walravens, Martin Buber und Willy Tonn und ihre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Monumenta Serica*, 42 (1994), pp. 464-481.

8 Ibid, p. 469.

9 Ibid, p. 470.

10 Martin Buber, *Chinese Tales: Zhuangzi, Sayings and Parables and Chinese Ghosts and Love Stories,* Translated by Alex Pag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Irene E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1.

比较-正文.indd 108 17-12-14 下午4:14

二、翻译篇目

布伯本人的汉语水平并不娴熟，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他的《聊斋志异》德语译本转译自英语，选用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的英语译本（1909年新版），该版本选译了164篇故事；此外，布伯的翻译得益于中国人王警涛的襄助。翟理斯译本各篇故事的标题与汉语并非一一对应，而布伯的翻译也基本上完全遵照了这个译本。下表列出翟理斯篇名英译和布伯篇名的德译，以及这些译名的汉语回译，从中不难窥见两位译者的处理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篇名。

篇目中文题名	篇目德文译名	德文题名回译	篇目英文译名	英文题名回译
画壁	Das Wandbild	壁画	The Painted Wall	画了画的墙壁
陆判	Der Richter	法官	Judge Lu	姓陆的法官
婴宁	Das lachende Mädchen	笑的女孩	Miss Ying-ning; or, the Laughing Girl	婴宁小姐，或笑的女孩
莲香	Die Füchsin	母狐狸	Miss Lien-Hsiang, The Fox-girl	莲香小姐，或狐狸女孩
阿宝	Die Wege des Liebenden	恋人之路	(Miss A-pao) or Perseverance Rewarded	阿宝小姐，或毅力的回报
竹青	Die Krähen	鸦	The Man Who Was Changed into a Crow	变成乌鸦的男人
香玉	Die Blumenfrauen	花之女	The Flower-nymphs	花之仙女
*书痴	Der närrische Student	愚笨的学生		
雷曹	Der GottimExil	被放逐的神	The Thunder God	雷神
罗刹海市	Das Land im Meer	海中之国	The Lo-cha's Country and the Sea Market	罗刹国和海市
*翩翩	Das Blätterkleid	叶衣		
*巩仙	Der Ärmel des Priesters	神父的袖子		
莲花公主	Der Traum	梦	The Princess Lily	莲花公主
*宦娘	Musik	音乐		
*阿绣	Die Schwestern	姐妹		
*小谢	Wiedergeburt	重生		

根据魏汉茂的研究，表格中标有星号标记的六篇实为王警涛初译，而布伯对其做了大幅度的加工修改。[1]在布伯留给后代的手稿中，可以找到《翩翩》、《书痴》和《小谢》三篇，手稿上的笔迹都是王警涛的，稿子上的德语虽然尚可让人理解，但完全无法与布伯笔下的优美德语相提并论。[2]另外，这六篇小说也是翟理斯根本没有翻译过的。在王警涛跟布伯的通信中，也可看到王询

1 Hartmut Walravens, Martin Buber und Willy Tonn und ihre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Monumenta Serica*, 42 (1994), p. 468.

2 Irene Eber, Einleitung, in Irene Eber, (Hrsg.), *Martin Buber Werkausgabe 2.3. Schriften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3, p. 30.

比较-正文.indd 109　17-12-14 下午4:14

问“修改”一事的内容，[1]指的就是布伯对这几篇译稿的“修改”。可以推断的是，王警涛的初步翻译乃自己独立所为，但是也有可能采取了另外一种前人用过的合作式译述之法。《小谢》的文稿上写的是布伯的笔迹，但是译文非常粗糙，这暗示很有可能是王用口授的方式叙说了故事大意，而布伯则记录下一些不成句的关键词，其间还停下来就某些概念发问。[2]这样一来，译文就带有一种类似《聊斋志异》原著固有的、记载他人所述的“志异”色彩。这跟晚清翻译家林纾与其合作者的翻译方法如出一辙——这位不通任何外文的翻译家，却靠记录别人口述的方式翻译出百余种外国经典文学名著。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英文标题几乎完全对应的有“画壁”、“陆判”、“莲花公主”、“书痴”、“雷曹”、“罗刹海市”；而“婴宁”、“莲香”和“阿宝”则采取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即先音译出女主人公的名字，接着用转化策略描述她们的身份或性格特质（“婴宁”和“莲香”），或者是点出全篇主题词或决定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词（“阿宝”）；但“竹青”和“香玉”则没有音译上的处理，仅意译出主人公的关键特征。就表格中所列翟理斯的英文翻译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早年他就翻译过那篇《罗刹海市》，发表在上海华洋通闻社编辑的《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杂志1877年3月29日版，[3]而当时翻译的题名跟表格中的相同，也是The Lo-Ch’a Country and Sea Market（《罗刹乡和海市》）。而就德语译名而言，“画壁”、“陆判”和“书痴”几乎可以跟中文名完全对应，而其余的译名皆是意译或转译，其翻译策略跟翟理斯的相似，要么是描述主人公的身份或性格特征，要么是陈述全文的主题或关键词。值得一提的是《罗刹海市》，原篇名凸显的罗刹国和海市龙宫实则是两个不同的地名，布伯的译名das Land im Meer（“海中之国”）只提及了一个地方，但突出了两地的共同特征——在海之中，因为罗刹与海市都是主人公马骥“浮海”时所到之地，都在水下。此外还有翟理斯未译的一篇《阿绣》，布伯译为Die Schwestern，翟的英译中同样有一篇题为The Sisters，但此篇译自《姐妹易嫁》。

另外，这个德译本的初版和再版都在译文之前附上了译者布伯撰写的《导言》，对《聊斋志异》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介绍。导言在欧美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邝如丝（Rose Quong）1946年的英译本《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即转录了布伯导言的英译。[4]布伯在译者前言中简介了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并将《聊斋自志》的部分内容翻译了出来：“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5]

布伯还在导言中写道：“翟理斯翻译出版的《聊斋志异选》（伦敦，1909年新版）包含有多篇故事，但是他按照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将他认为有悖的地方悉数删去或者改写。我在王先生的帮助下将翟理思书中的多个故事完全忠实地重译了一遍，还收入了几篇至今没有翻译过的。除了那些我出于其他原因不想错过的那几篇，我挑选的皆是关乎人鬼恋最美丽动人的故事。”[6]翟理斯在翻译时删改原作内容，是出自维护和强调中国文学纯洁性的动机。他在《中国之文明》里就声称只有纯洁的文学才能满足高品味，并认为中国浩如烟海的诗歌里几无不洁内容，然而一旦进入小

1 Hartmut Walravens, Martin Buber und Willy Tonn und ihre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Monumenta Serica*, 42 (1994), pp. 470-471.

2 Irene Eber, Einleitung, in Irene Eber, (Hrsg.), *Martin Buber Werkausgabe 2.3. Schriften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3, pp. 30-31.

3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

4 同上，第219和227页。

5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928, p. xi.

6 Ibid, p. xv.

比较-正文.indd 110 17-12-14 下午4:14

说，文学的高尚标准就常被破坏。[1]这位经历了以拘谨肃整文风而著称的整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汉学家，在向本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时也不得不考虑当时英国读者的接受品位和审美取向。也许正是基于这重顾虑，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封面上还特别注明了“在英国女王陛下领事馆任上所作”。

翟理斯的“因时删改”在译作《莲香》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其中有一段涉及狎昵的不雅内容，就被他完全略去不译：

既而罗襦衿解，俨然处子。女曰：“妾为情缘，葳蕤之质，一朝失守，不嫌鄙陋，愿常侍枕席。房中得毋有人否？[2]

而在布伯的译文中，这一段文字悉数译出：

Dann entkleidete sie sich, und er sah, daß sie eine Jungfrau war. Sie sagte: “Ich will heute aus Liebe zu Ihnen meine Unberührtheit opfern. Wenn Sie mich nicht gering schätzen, werde ich gern Ihren Kissen und Matten dienen.”Später fragte sie: “Kommt sonst jemand zu Ihnen?”[3]

而另一段文字关涉嘴喂唾沫等香艳热辣的描写：

> 问：“何需？”曰：“樱口中一点香唾耳。我一丸进，烦接口而唾之。”李晕生颐颊，俯首转侧而视其履。莲戏曰：“妹所得意惟履耳！”李益惭，俯仰若无所容。莲曰：“此平时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纳生吻，转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莲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间，腹殷然如雷鸣。复纳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气。生觉丹田火热，精神焕发。莲曰：“愈矣！”[4]

翟理斯的译文非常简洁，剔除了原文的诸多细节描写，读者见到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医疗过程和结果。

Miss Li did as she was told, and put the pills Lien-hsiang gave her one after another into Sang’s mouth. They burnt his inside like fire; but soon vitality began to return, and Lien-hsiang cried out, “He is cured!”[5]

布伯对以上文字的处理则全然不同，几乎一字一句地全部译出，没有任何删节或改动。[6]此处可以看出，布伯的这篇《莲香》翻译并非完全基于翟理斯的译文，即便我们相信上面提及的魏汉茂的说法，王警涛也肯定通读了布伯的译文并对照中文原文添加了翟理斯删去未译的“不洁”部分。

作为小说家的蒲松龄善于在散文体小说中插入短的诗行，这无疑是《聊斋志异》的一大创作特色。布伯译本中有四篇故事的原文都含有诗歌元素：《香玉》中香玉和黄生的多首五言和诗，《巩仙》中尚秀才和妓女惠哥的七言联诗，《翩翩》中翩翩唱出的四言诗歌，《宦娘》中的《惜余春》词。这些诗词在布伯译文中无一例外地用韵文形式译出。另外，《书痴》中提及书生日夜诵读的“劝学篇”也以诗歌形式译出。原文仅提及“非为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可见指的就是宋代诗人赵恒的《劝学诗》，但并没有列出诗的全部。而在布伯的译文中，“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这十句诗均用韵文译出。[7]以上五篇中的诗词可以肯定是王警涛初译，而布伯对译文做了语言上的加工和润色。能将全部韵文悉数译出，而且在很多时候都兼顾到了韵脚，可见王警涛对古典诗词的熟稔，当然布伯的再加工也功不可没。

1 H. A. Giles,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11, pp. 128-129.
2 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1页。
3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928, p. 40.
4 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227页。
5 H. A. Giles, (tran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Co, 1880, p. 177.
6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928, pp. 49-50.
7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928, p. 89; 中文参见：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53页。

比较-正文.indd 111　17-12-14 下午4:14

另外，蒲松龄的写作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历史传记的范式，《聊斋志异》中多篇故事以类似《史记》“太史公曰”的评论收尾。在布伯选译的16篇故事中，含有“异史氏曰”评注的有《阿宝》、《陆判》、《香玉》、《雷曹》、《莲香》、《罗刹海市》、《婴宁》、《书痴》、《巩仙》、《翩翩》和《小谢》11篇，而布伯无一例外地省译了点评部分。如果说前七篇略去评论不译是遵循了原译者翟理斯的译法，那么缘何王警涛和布伯新译的后四篇也同样撇去不译？是王警涛译出而被布伯删去，抑或是王一开始就没有译出？惜乎斯人已邈，个中缘由已不可探。

三、翻译动机

布伯翻译《聊斋志异》，自然有王警涛的直接促成发生作用，布伯后人处藏有的二人通信也显示出是王警涛向他推荐了《聊斋志异》这部奇书。虽然布伯的德译本对德语世界的中国文学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他翻译的兴趣和出发点不在于文学或者汉学，而是因为其中的怪异和神秘主义以及宗教背景令他着迷。在蒲松龄笔下的世界里，人类和精灵鬼怪在同一世界里共存，布伯称之有“一种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魔力”。[1]考察布伯选译的16篇作品，可以看出好几篇的母题皆是凄美绝伦、摄人心魄的人鬼恋，比如《婴宁》、《莲香》、《阿宝》、《阿绣》、《小谢》等等。再看布伯译本的题名《中国鬼怪爱情故事》，人鬼恋无疑是这个书名的核心关键词。布伯在译本导言里提及《聊斋志异》中的主角就是那些鬼灵精怪，它们“数目最多、意义最大”，而它们与人类相亲相爱有时具有威胁性，但常常只会给人带来庇佑和福祉。[2]值得一提的是，布伯还能从鬼怪的角度出发，并对它们的情愫感同身受——“对鬼怪来说，爱就是一种自我实现”。[3]鲁迅先生在论及《聊斋志异》时写道：“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4]描摹精灵鬼怪，《聊斋志异》绝非首创，但此前的作品往往因为充溢着假想的构造而显得极不真实，缺乏一种令人着迷的神秘性和灵动张扬的“生命力”。而在蒲松龄的笔下则截然不同，他将各种妖魔鬼怪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且闪动着一种生动的矛盾的张力，一种在真实与假想、现实与幻境之间的漂浮不定；但它们又不是完全脱离真实，而是在心理层面上令人信服地折射出人类情感的真实性。[5]在《聊斋志异》中的狐鬼神妖身上，已看不到什么狐性、鬼性、神性、妖性，看到的只是一种人化了的性情，即人性美、人情味甚至人伦道义，这无疑彰显了《聊斋志异》的人文气息和充盈作品其中的“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元素。

蒲松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对爱情故事的艺术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追溯明代以来的叙事作品，可以发现其中的爱情故事多半在性爱的圈子里打转，更为壮烈凄美的爱情自古以来大都是诗词抒情或者讴歌的对象，而不会出现在长期屈居韵文之后的“世俗”小说之中，而《聊斋志异》在此可以说有首开先河之功；[6]另外，蒲松龄给笔下的爱情故事赋予了新的维度，因为爱情双方中的一方来自异常的、精灵鬼怪的世界，爱情就被注入了一种神秘而惊险的魔力，给予恋爱中的双方共同升华的精神世界，使人获得一种全新的世界观。[7]正如蒲松龄在《香玉》结尾的评论中一语中的地指出的，“情之至者，鬼神可通”。[8]而细究这几篇爱情故事，又有其各自不同的层面和内蕴。《画壁》展现了一系列的佛教主题，并将爱情感受上升到宗教体验带来的灵魂

1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928, p. ix.
2 Ibid, p. xiv.
3 Ibid, p. xiv.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
5 莫宜佳，《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韦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6 同上，第258页。
7 同上，第258页。
8 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55页。

比较-正文.indd 112 17-12-14 下午4:14

升华的高度。《阿宝》则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以身体和灵魂分离的方式所实现的“精神恋爱”的故事，体现了肉体与精神之爱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莲香》和《香玉》两篇同样触及了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的母题，只不过这里二者都人格化了，[1]两种爱情都由活生生的人或精灵鬼怪代表，于是又出现了三角恋的关系：一方的爱热烈、奔放而性感，代表“肉体之爱”（《莲香》中的莲香和《香玉》中的香玉）；而另一方的爱温吞、矜持而绵长，代表“精神之爱”（《莲香》中的李氏和《香玉》中的绛雪）。

在布伯选译的这些人鬼爱情故事中，狐仙或狐狸精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她们为爱情故事主角的有《婴宁》、《莲香》和《莲花公主》等。对此布伯在译者前言中写道：

> 其中狐狸精占有特殊的位置，她们化身多种不同的人，但大多是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去接近一位男子，得到他的爱，为他生小孩、管理家务，并且靠着跟他相依相伴而获得一种较为稳固和宽松的生存方式。人们解释偏爱狐狸精的原因在于，当狐狸在冬天越过结冰的河流或湖泊的时候，其头部都要紧挨着冰面，倾听着里面的流水。这样狐狸就把冰下的世界即女性的、黑暗的“阴”与冰上的、男性的、光明的“阳”连接了起来。[2]

布伯对《聊斋志异》的兴趣跟他先前集中精力研究的犹太教哈希德派有着紧密联系。[3]他在故事里窥见了鬼神和人类在现世生活中的交会，他称之为“一统”或“同一”，而这种“合一”的观念在道教和哈希德派都有明显体现。无独有偶的是，除了《聊斋志异》，布伯还翻译过其他道教经籍，比如他几乎在同一时期翻译了《庄子语录和寓言》，后来还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翻译成了希伯来语。尽管布伯在研究哈希德派时关注的是接近上帝等宗教题旨，但他在《聊斋志异》人与鬼怪的融洽共处中感知到了一些东西，而这些跟他研究的宗教思想并非完全相异。时至今日，《聊斋志异》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蒲松龄笔下看似叙述简单的故事实则具有罕见的深度，彰显了惊人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布伯就业已认识到《聊斋志异》蕴含着哲学和宗教因子，同时也潜藏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在布伯看来，中国人思想中的“同一”观念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秩序，它囊括了整个世界及其以外的东西，而人世和鬼界这两个领域并不是互相隔绝的，它们经常会以一种波谲云诡而又从不紊乱的方式交织互动。但是布伯自己的“同一”观念建立在一个迥然不同的根基之上，而且受到他有关犹太人生存“二元论”假设的影响。[4]在他看来，犹太人永远都在历史和现存的矛盾之间游移摇摆，因此犹太教的创造性动力就在于顺应这些矛盾，并且试着克服“二元论”以实现“一统”。[5]

布伯在翻译《聊斋志异》时首度形成的观念也在以后不同的场合出现。在几年以后的一场演讲中，他再次提出克服“二元制”的问题。[6]这场报告题为《东方和犹太教之精神》，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比之西方思潮，犹太教与东方诸如印度、近东和中国的思想观念有着更为密切的临近关系。[7]在布伯的眼中，西方的人文思想打上了二元制的烙印，西方人让世界客观化，这样一来，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万事万物就硬是被人为地区分开来了。反之，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里则存在着一种以人鬼共处为表征的和谐安宁、井然有序和生命传承，对此布伯在《聊斋志异》译本前言里饱含溢美之辞地写道：“自然的秩序在此未被打破，

1 莫宜佳，《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韦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2 Ibid, pp. 453-454.
3 Irene Eber, Martin Buber and Taoism, in *Monumenta Serica*, 42(1994), p. 453.
4 Ibid, p. 453.
5 Hans Kohn, *Martin Buber, sein Werk und seine Zeit, ein Beiträg zur Geistesgeschichte Mitteleuropas, 1880-1930*, 1961, Köln: Melzer, p. 77, 87, 100.
6 Rita Van de Sandt, *Martin Bubers bildnerische Tätigkeit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Stuttgart: Klett, 1977, pp. 20-21.
7 Martin Buber, *Der Jude und sein Judentum, gesammelte Aufsätze und Rede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Weltsch, Köln: Melzer, 1963, pp. 46-65.

比较-正文.indd 113　17-12-14 下午4:14

而是得到了扩展：处处充盈着勃勃生机而不会停滞消亡，而一切生命之源都来自鬼怪”。[1]在布伯看来，不光有生命的动植物可以成为鬼怪，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岩石、画壁中间也可以有精魂绽放，它们都想要化身人形或结出果实，并进入人的生活，但这一切并不阴森可怕，因为“这就是家，就是生活”。[2]

但是，布伯早期对《聊斋志异》以及《庄子》和《道德经》的涉猎并没有让他走上一条深入研究道教之路，道家思想在他的其余作品中也没得到更深入的体现。因此，只能推测出布伯在一定时期选取了迎合其宗教思想的部分道家思想内容，然后把它们重新诠释，以植入其哲学对话。这在译本的前言中也得到了印证：“在这个民族中间，一切皆为‘道’的老子学说和一切行动皆有结果的佛教学说共存共融，在其鬼怪故事中构想了一曲如兄弟姐妹般的相亲相爱之歌，一曲献给众神和人类的歌。”[3]除了这些宗教思想元素，布伯也洞见了《聊斋志异》的社会批判性，认为“故事中间又不乏讽刺意味，嘲讽不公的官员、徇私的考官、不学无术的医生、欺骗撒谎的道士，故事描述的阴间社会状况跟人世间的颇为相似”[4]。作为宗教思想家、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布伯，他对《聊斋志异》的翻译动机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猎奇求异层面，而是上升到探究中华文化思想根基、尝试着洞悉华夏民族普遍世界观的高度。

四、译本接受

上个世纪初翻译成德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布伯的《聊斋志异》虽然不乏瑕疵，但仍在德语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多家报纸上都出现了相关书评，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也是撰写者之一。黑塞是二十世纪对中国最感兴趣、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最关注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布伯的朋友。黑塞的书评发表在1912年3月25日的《新苏黎世报》，称赞这个译本是他读过的除《诗经》和《庄子》以外诗意最浓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布伯多种著译中最美妙有趣的一本。[5]为了让德语区读者对这部书有一个更为直观和明晰的概念，黑塞将《聊斋志异》与格林兄弟和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童话相提并论，同时指出《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的宗旨在于宣扬真善美，而不像西方很多童话故事一样充满险恶和阴毒。[6]在黑塞看来，《聊斋志异》与霍夫曼童话的相似之处在于人类与鬼神世界没有明显的区分，鬼怪们大都在白天活动，并且与人类在相互爱慕和友好的气氛中密切往来。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小说中人神之间的相互幻化和变形呈现出离奇混乱的梦幻色彩，但他们与现实相联系，以人类陌生的方式展现人情事态以及幸福与苦涩的人类情感。[7]黑塞虽在有生之年未曾造访中国，但他到过东南亚比如新加坡，从卫礼贤等人的翻译中饱读了大量中国典籍，深谙中国古典文化。这从他对《聊斋志异》充盈着美丽比喻的评论也可窥见：他把这本“如此和谐均匀而又混乱无序”的书比喻成一幅“古老的中国刺绣挂毯”，“上面有鸟有龙有花草人物树木彩霞，这些花样并存于绣品上，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连接如何自成一格安详快乐的世界的，我们西方人看着觉得美，却无法解释，也无法学”。[8]他还列举了几篇代表性作品比如《狐仙》、《巩仙》和《梦》，并赞赏《狐仙》这篇故事“温婉而优雅”，又说《梦》“或许是全书最美的一个故事”，其中“梦境和现实柔和、灵动而巧妙地糅合在一起”。[9]

1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 & Loening, 1928, p. ix.
2 Ibid, p. x.
3 Ibid.
4 Martin Buber,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 & Loening, 1928, p. xiii.
5 赫尔曼·黑塞，《黑塞之中国》，孚克·米歇尔斯（编选），谢莹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6 同上，第124页。
7 Hermann Hesse,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II (Gesammelte Werke 1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pp. 38-39.
8 赫尔曼·黑塞，《黑塞之中国》，孚克·米歇尔斯（编选），谢莹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24页。
9 同上，第125页。

比较-正文.indd 114 17-12-14 下午4:14

1927年，卫礼贤创办的中国学院的门户期刊《中国学刊》（*Sinica*）杂志上也出现了相关书评，署名为hm，不知为谁。书评称赞布伯的翻译“容易理解”而且“富于纤巧的感同身受”，[1]大段引用了黑塞对该书的褒奖之辞，并配有两幅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收藏的原作的插图——《莲香》和《宦娘》。这个译本还引起了德国新古典主义作家保罗·恩斯特（Paul Ernst，1866-1933）的注意，他在称赞之余还指出，“中国古诗已经译成德语供国内读者品鉴，但这类独特的故事还是第一次在德国付梓”。[2]卡夫卡阅读了布伯译本后赞叹不已，在1913年1月16日致友人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布伯出版了《中国鬼神爱情故事选》，就我所知，这些故事精妙绝伦。”[3]1912年3月19日，人智学之父、“以人为本”的华德福教育创办者、奥地利学者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 1861-1925）在柏林演讲时也提及了布伯的这本译作。[4] 1914年，同为童话作家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根据布伯选译本中的《梦》（即《莲花公主》）改编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但对原作的改动较大：《莲花公主》突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而《蜜蜂》展示的是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5]该剧于1916年在德国首演，曾在欧洲引起轰动。

五、结语

马丁·布伯的《聊斋志异》选译本是较早的德语译本，在整个西方世界也有较大影响，但至今仍未引起国内《聊斋志异》研究者的足够关注。作为神学家和思想家的布伯，在翻译时参考了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英译本，又在中国助手王警涛的帮助下译出几篇翟理斯未曾译过的篇目。布伯的译本较为成功地再现了原篇目中的诗歌元素和诗性特征，但跟翟理斯一样采取了舍弃原作结尾评注的翻译策略。布伯的翻译动机主要是为了探究《聊斋志异》背后潜藏的中国宗教和思想元素，尤其是“天人合一”的“同一”观念。在具体篇目选择方面，他首选的是那些摄人心魄的人鬼恋故事，凸显了原著对爱情故事的独到性贡献。总之，马丁·布伯的《聊斋志异》译本彰显了中国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短篇小说这一文类对西方的深远影响，是以古典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软实力”迈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1 Hm, Bücherschau,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Verlag，1927, 23-25. Tausend, XV, 204 Seiten. In: *Sinica* 1927(11-12), p. 236.

2 Irene Eber, Einleitung, in Irene Eber, (Hrsg.), *Martin Buber Werkausgabe 2.3. Schriften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3, p. 33.

3 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9卷，叶廷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4 Rudolf Steiner, Der irdische und der kosmische Mensch. EinZyklus von neunVorträgen, Berlin, 23. 10. 1911 und 19. 03. - 20. 06. 1912. http://anthroposophie.byu.edu/vortraege/133.pdf, 检索于2015年5月19日。

5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比较-正文.indd 115　17-12-14 下午4:14